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真相发覆

张 剑

内容摘要:近代私人目录学名著《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系莫友芝在同治六年十二月中旬至同治七年二月初的较短时间内，撮录邵懿辰、张金吾、阮元、于敏中、彭元瑞、钱曾等人著述并杂以己见而成，因而存在诸多缺陷，莫友芝并无意成书。后人或罔于莫绳孙之序，或慑于莫友芝之名，相信《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系莫友芝长期笺注《四库简明目录》的重要成果，堪与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齐名，这种判断距离事实真相甚远。

关键词:莫友芝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 邵懿辰 《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莫绳孙

中国近代私人目录学史上，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与莫友芝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均是对《四库简明目录》所做的知见（包括直接所见和间接所知）书目标注，百余年来并驾齐驱，同享盛名。但是，笔者在研治《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的过程中，却发现该书实难与盛名相副。后世读者，或罔于莫绳孙之序，或慑于莫友芝之名，误读谬判，构伪诈真，距离事实越来越远，有必要正本澄源，认真清理。

今存《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有莫友芝手笺本、抄本、印本之别^①。莫友芝家藏乾隆四十九年赵怀玉刻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上，留有莫友芝大量手批笺注，经仔细核对内容，发现与莫绳孙整理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高度

^①抄本与印本种类，傅嘉年《〈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原稿本及主要传本简介》（《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首附录，中华书局，2009年，第20-23页）及薛雅文《莫友芝之目录版本学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第131-132页）已有介绍，兹不赘述。至于两家遗漏之处，如傅氏未看到光绪二年王春抄本，薛氏未看到莫绳孙同治十二年抄本，两家俱未看到“手笺本”及黑龙江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傅氏称莫绳孙抄本为“原稿本”之未妥，薛氏误认王春抄本为最早之抄本等，因与本文主题关涉不大，笔者拟另文述之。

相似,系莫绳孙本整理本的原始底本无疑,弥足珍贵。该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框 9.1×12.8cm,共 12 册,首册书名页与正文之间的扉页有六枚铃印,分别是“莫氏友芝”朱方,“邵亭畹叟”白方,“莫氏伯鬯”白方,“莫绳孙”白方,“彝子孙”朱方,“仲武”朱方,首册首叶为“圣谕文字”,首行下有三枚铃印,依次为“莫友芝图书印”朱长方,“莫印彝孙”朱方,“莫印绳孙”白方。该本无疑是研治《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史料,姑称之为“莫友芝手笺本”(以下简称“手笺本”)。抄本以同治十二年莫绳孙整理本最早,其后转相移录,递相补益,不同程度地损失了手笺本原貌。印本则始于 1909 年日人田中庆太郎在北京刊印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而傅嘉年整理的《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1993 年中华书局出版)最为晚出,且订补文字较手笺本多出三倍半,实际上已另成一书。

自 1909 年田中印本问世,《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迅速风行且声誉四起,叶德辉赞云:“先生是目虽与邵注同注,而见闻各别。盖邵官枢曹,居恒在北,先生则往来苏、扬、沪渚,值粤匪乱后,江浙间藏书散出,先生寓目颇多。南北收藏,各以地限,两目所载,正可互证参稽……并辔而驰。”^①潘承弼赞云:“考论版片之学者,咸奉先生此书及邵位西先生《四库简目标注》为金科玉律。”^②今人郑伟章更云:“专记一书的异本者,推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为最早。发展到清末,可谓达于高峰,其代表作有两种,一是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即莫氏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③但是,经过对手笺本的认真梳理,我们震惊地发现,该本至少存在着足以颠覆上述评价的两大缺憾。

首先,手笺本中大量撮录他人目录学著述内容,数量远多于言己所见。其中撮录超过百次的清人之著即有五种,依征引多寡为序分别是: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和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合计一种)、钱曾《读书敏求记》。用手笺本与此五种目录相核,直接抄录或脱胎于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内容竟超过全书一半以上^④;再计入其他四种书目,总量几占手笺本内容四分之三。手笺本中还摘引了不少朱彝尊、黄丕烈、汪士钟、汪士骥(铁樵)等人的著述,倘再将之除外,则手笺本中属于莫氏自己的内容非常有限。

①叶德辉:《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序,《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首附录,第 16 页。

②潘承弼:《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稿本跋,《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首附录,第 18 页。

③郑伟章:《莫友芝的藏书和目录学》,《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

④以光绪三十年缪荃孙、吴庆坻批校《简明四库目录标注》为据统计,该本系邵章 1911 年整理的邵氏家塾刊本《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底本,较为可靠;并参以《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华书局,195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该本系邵章之子邵友诚对邵氏家塾刊本《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增订。

其次,撮录他著多有缺失,未尽他著之长。今以其征引最巨之《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为例,分三类言之。

一类是撮录常有缺漏。有的是邵本某些条目做了笺注而手笺本失录。如经部中“《周易易简说》三卷”、“《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春秋说》三十卷”等条,邵本均有笺注而手笺本皆无。再如经部“《翻译五经》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条,邵本作:

平津馆目有陈凤梧刊《篆文仪礼》二十卷,十七篇外,益以《奔丧》、《投壶》、《深衣》三篇。《篆文五经》八十卷,明陈凤梧篆,有刊本。《篆文九经》五十卷,清张照篆,有刊本。监本《六经》六十三卷,《易》四卷、《书》六卷、《诗》八卷、《礼记》十卷、《春秋三传》十六卷、《四书》十九卷,嘉庆十年刊本。

而手笺本仅笺云:“《提要》作五十八卷。”缺漏邵本所有笺注文字。有的是邵本该条笺注版本较多而手笺本只取其部分,如卷一“《易纂言》十卷”条,邵本作:“通志堂本十三卷。成化丁亥刊本。嘉靖中顾应祥刊本。许氏又有明刻本十二卷,似即此本。”手笺本仅作:“嘉靖中顾应祥刊本。通志堂本十三卷。”有的是邵本信息完整,而手笺本节略不当或有所脱漏,如“《性理大全书》七十卷”条,邵本有“康熙十二年内府刊本,系就明板重修”,手笺本节略为“康熙时内府刊本”,导致版本信息受损。“《艺文类聚》一百卷”条,邵本有“明闻人诠刊本,张目有冯己苍依宋刊校本”,手笺本将之撮录为“闻人本,有冯己苍据宋刻校”,如果节略朝代“明”及出处“张目”(即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还只是减少了信息量,脱漏人名“诠”字则只能视为失误了。

一类是撮录不乏错乱。如“《四书辑释》三十六卷”条,邵本作“朱《考》曰存”,手笺本误将“考曰”两字合成“耆”字。“《发微论》一卷”条,邵本作“明弘治刊本。谢昌注本。地理大全本”,手笺本全袭邵本,而将“谢昌”误衍作“谢昌德”。“《孙子》一卷”条,邵本有“臧叔晋兵垣四书本”,手笺本误“臧”为“盛”。“《司马法》一卷”条,邵本有“邢澍辑注本五卷”,手笺本误“邢”为“邱”。“《潜夫论》十卷”条,全袭邵本,却将邵本中“湖海楼丛书汪继培笺注本”抄作“汪季培笺注本。湖海楼丛书本”,既将“继”错抄为“季”,又将一种版本割裂为两种。“《西昆酬唱集》二卷”条更是离奇,邵本作“浦城丛书本。徐乾学刊本。康熙戊子朱俊升刊本”。手笺本将之撮录调整为“康熙中刊注本。徐乾学刊本。浦城遗书本”,但随后即窜录进邵本“《唐文粹》”条中“天禄后目有宋宝元二年刊本二部,元本二部”一段(且将“元本”误抄作“元年”),复注云:“《天禄目》无此书,亦无元本,恐是后目。且宝元恐是《文粹》也。”文既窜乱,注自然莫名其妙。

一类是撮录不注出处。手笺本虽亦有“天禄目”、“张氏志”、“敏求记”、“阮氏”、“钱氏”、“何氏”之类提示,但更多的是直接撮录,而略去出处。如“《易纂言外翼》八卷”条,手笺本中“又明人有书帕本,往往刷印此书数十种,即称某丛

书。余尝见唐宋丛书即是也”一段抄自邵本的朱学勤(修伯)语,却未做标记,使人误以为是莫氏所笺。至于其他抄自邵本的数千处文字,亦罕见注出。

至此,我们已然明白《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的尴尬处境:其汇抄诸家,便嫌自家之力不足;但又系节抄,便无法替代所抄之书;欲将之视为诸家选编,却又时见错乱之处,而且多未标明何者为他人之语,何者为莫氏自述,使人无法放心利用。因此,客观而论,《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的文献学价值,实逊于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两者难称双峰并峙。

降低了《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的文献学高度,不等于取消其文献学意义。《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毕竟记载了莫友芝生平访书之见闻心得,且颇有诸家书目不备者;对邵书的撮抄,固然失误不少,但也不乏对其补正加详之处,如“《梅溪词》一卷”条,邵本误作汲古阁“三集”,而手笺本改正为“二集”;“《凤池吟稿》十卷”条,邵本作“有刊本”,手笺本增详为“有刊本八卷”,等等^①。但是,只有将《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与其撮录之书仔细核对,标明出处,且利用今存公私藏书,通检其得失,在此基础上做一精审校笺,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文献学功能,使之真正成为近代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工具书。

二

莫友芝生前,并无编著《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的打算。他笺注《四库简明目录》的因缘,相当偶然。

同治六年(1867)莫友芝往浙江一带访书,八月十五日至九月七日,在杭州与高均儒、许增、孙衣言、丁申、丁丙、宗源瀚、曹藩等名流往来甚欢,得观大批秘笈,并借得丁丙所藏一种邵懿辰标注《四库简明目录》的副本。之后,莫氏转往苏州为丁日昌持静斋藏书编目,因尚未归还邵目,遂于十一月四日致函高均儒,托其向丁丙解释原由:

邵蕙西所见书目,非以《四库简明目》宽大本手过即不了了。当俟还金陵度岁,取家中本竭半月之力为之。乞致意松生,须稍迟乃归也。^②可见他是因为借阅丁丙所藏的邵目,才萌发了在家藏《四库简明目录》上过录邵目的想法。其后莫友芝也大致按信中所言去践行,不过非是“竭半月之力”,而是花了两个月左右时间才完成了邵目的过录工作。尽管如此,由于此期间莫

①《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的文献学价值,亦可参薛雅文《莫友芝之目录版本学研究》和陈海花《莫友芝与〈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山东大学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论文)相关内容。

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莫友芝《邵亭尺牋手稿》录识。案:宣统三年邵章定名《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前,邵目有多种抄本流传,内容大同小异,但并无一定之名。莫友芝信中“邵蕙西所见书目”以及后文征引莫友芝手笺本卷一首页识语、莫绳孙抄本序中所谓“邵位西所见经籍笔记”,亦是此前抄本之一,其中少量内容不见于今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惜此抄本原貌已无从见到。

友芝还有不少其他活动,其摘抄笺录仍显仓促,以至既多漏误,又未及一一标出出处,留下了诸多遗憾。通过手笺本中莫友芝相关识语和《邵亭日记》^①中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较为具体地排比出莫氏的笺录经过:

同治六年十二月七日,回到南京坊口寓所。

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开始笺注家藏《四库简明目录》。

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寓中笺毕经部。

同治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在南京寓中笺毕史部。

同治七年正月初二日,在南京寓中笺毕子部儒家类。

同治七年正月十五日,在南京寓中笺毕全部子部。

同治七年正月廿一日,登舟往苏州。

同治七年正月廿六日,阻风东沟,于舟中笺毕集部唐以上卷。

同治七年正月廿八日,晚泊丹阳,舟中笺毕集部北宋卷。

同治七年正月廿九日,逆风至奔牛泊,舟中笺毕集部南宋卷。

同治七年二月二日,至苏州阊门外泊,因风雨不能入城,舟中笺毕集部金元明卷。

同治七年二月四日晨,舟中笺毕集部最后两卷。

时间、过程之详细,阅之历历在目,无须多说。不过,与之相关的情况仍应补充几点:

一是笺录基本完成后很快有了一次较为集中的增补,《邵亭日记》同治七年二月十一日记:“数日无事,以阮文达所进呈四库未收书百七十三种,依部类节录于《简明目录》卷端,昏眩作辍,今晨乃毕功。”即使算上这次增补,从同治六年十二月七日至同治七年二月十一日,手笺本的完成亦不过历时两月挂零,况且此间诸事纷纭,笺录时断时续,莫友芝花费其上的工夫笃定不会超过两个月。

二是手笺本卷一首叶边栏外,有一行非常重要的莫友芝识语:

此目录中标记,半用邵位西所见经籍笔记,及汪铁樵朱笔于邵本中勘注,并邵亭所知见粗书之。丁卯腊月三山客舍。

这说明莫友芝从笺注开始,想法已略有改变,即并非只过录邵目,而是以邵目为主,兼将汪士骥在邵目中的朱笔批注及自己所见书目一并笺录,如上文已言及钱曾、于敏中、彭元瑞、黄丕烈、阮元、张金吾等人的著述也都被莫氏采录不少。

三是同治十年莫友芝辞世,其子莫绳孙守礼期间,开始誊写整理手笺本,将之编为十六卷,定名《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序云:

^①“手笺本”相关识语,分别存于该本卷四、卷八、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八、卷二十末叶。《邵亭日记》相关记载,参张剑整理《莫友芝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相应日期。为省篇幅,节略原文。

先君子于经籍刊板善劣、时代，每笺志《四库简目》当条之下，间及存目。其《四库》未收者，亦记诸上下方。又采录邵位西年丈懿辰所见经籍笔记益之，邵本有汪铁樵先生家骧^①朱笔记，并取焉。同治辛未，先君子弃养，绳孙谨依录为十六卷。凡经部《四库》存目者三^②，《四库》未收者百十八；史部存目者二十八，未收者二百有十；子部存目者十四，未收者百九十八；集部存目者一，未收者百二十一。其《四库》已著录未笺传本者^③并阙之。盖是书当与《简明目录》合观也。癸酉长夏，第二男绳孙谨志。

将该序与莫友芝手笺本卷一识语比勘，合之前述莫友芝笺录经过，则莫绳孙序的伪饰和误导之处昭然若揭。尤其“先君子于经籍刊板善劣、时代，每笺志《四库简目》当条之下……又采录邵位西年丈懿辰所见经籍笔记益之”一段，掩饰了莫友芝笺注《四库简明目录》的动机和偶然性。“每”字误导人们以为莫友芝的笺注和邵懿辰一样都是日积月累的长期工夫，“又”字误导人们以为莫氏先有笺注，后以邵目增益之。全然不知莫氏之工作是以先过录邵录为主，间就自身“知见粗书之”，费时不过两月而已。而且莫绳孙“录为十六卷”的做法也很不妥当，邵目、莫目既然都是对《四库简明目录》的笺注，莫目分为十六卷就打破了《四库简明目录》原本二十卷的结构，反有淆乱之嫌。当然，这是莫绳孙的问题，莫友芝不应任其咎。至于后世有些学者将莫绳孙抄本的“十六卷”甚至某些举烛之误反视作《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的特点，则又不是莫绳孙所能任其咎了。

莫绳孙之序是否有意伪饰，不好妄下断语。或许他确实不知乃父笺注《四库简明目录》的诸种缘由。光绪十七年（1891）从父弟莫棠过录其整理本时，莫绳孙对自家兄弟仍持此说：

伯父邵亭征君生平于所见所知四部书籍传本，辄随时笺记于《四库简明目录》之栏外上下端，间及存目。又采取仁和邵位西先生《经籍笔记》入焉。伯父既没，先从兄仲武观察绳孙乃依手迹写为四册，分十六卷。以当日特为便省览，非欲勒书行世，故无画一体例。光绪辛卯，棠向兄移录，为言如此。^④

不过莫绳孙到底向自家人多透露了一句莫友芝无意“勒书行世”的信息，也算是对其不靠谱序言的一种较为靠谱的补充。

以上便是《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的成书真相。由于百余年来人们受欺于莫

①清陆以湉《冷庐医话》（清光绪23年刻本）卷五有“杭州汪铁樵士骧”，据此汪铁樵当名汪士骧，莫绳孙言“家骧”，未知何据？

②“存”字上原衍“未”字，据文意删。

③莫绳孙抄本此处原有“经部四十五，史部五十六，子部二十五，集部六十五”，后以朱笔勾去。

④莫棠：《〈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跋》，《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首附录，第12页。

绳孙的伪饰之序,未能发现和利用手笈本,遂导致对《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无法正确认知,甚至以讹传讹,误解和曲解丛生。如今这百年之覆,终于可以彻底揭开了。

三

莫绳孙之序强调《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的成书是先有莫友芝的“笈志”,后“益之”以邵目。对于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不同声音。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就首发异议:“邵懿辰有《批注四库全书简明目》二十卷,无刻本。莫友芝《知见传本书目》即据以为底本。”^①之后,支伟成为邵懿辰作传时亦云:“传抄所见书目二十卷,则就《四库简明目录》一一考其版刻源流,标于书眉。独山莫氏即据此编《知见传目》云。”^②但此类说法不断遭到学界质疑,人们似乎更倾向相信莫绳孙和莫棠的序跋。其实即便叶德辉本人,也只是凭经验得出的笼统说法,而不曾对《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做全面认真的检核。他并不怀疑《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是莫友芝在较长时期内有计划地完成的成果,其价值可以媲美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见前引叶德辉《〈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序》)。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此类错觉和误判,手笈本一直未为世所知固然是最重要和直接的原因,但莫友芝生前经历与名声带来的“晕轮效应”,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莫友芝在道光年间,已与郑珍合撰《遵义府志》而名冠西南;咸丰九年(1859)试礼部,房官王拯推其为名家积学,荐之不售,在京城闻接四方英才,并得祁雋藻赏识,名声更振。咸丰十一年七月谒曾国藩于东流,从此成为曾幕中的重要成员。同治四年(1865),他奉曾国藩札委,往扬州、镇江一带搜求乾隆间颁存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散失零星之本;同治五年,又奉李鸿章札委,往江南诸郡游,续完采访两阁《四库全书》公干,兼查各儒学各书院官书兵后留存情况,得偿遍历名山大川,饱览秘笈善本,尽交魁儒豪彦之愿。之后又曾任江苏书局总校、淮南书局总校。去世后曾国藩亲往致吊,备极哀荣。

对于莫友芝这样一位以访书、校书、刻书为主要事业的饱学名宿,就情理而言,人们往往愿意相信其曾长期笈注过《四库简明目录》。这种有点盲目的相信,使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本可发现的疑窦。甚至对于莫氏出现的失误,也往往委过他人,不愿深究或难以看清光环中心的本相。

如近人杨康年曾批校田中本《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并部分对勘过邵懿辰

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古今藏书家纪板本》,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之《常州派今文经学家列传第七·邵懿辰》,《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9》,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第317页。该书亦为莫氏立传,详见《小学家列传第十二·莫友芝》,另见《校勘目录学家列传第十九·莫友芝》。奇怪的是,该书校勘目录学家列传中反而未列邵懿辰之名。

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也曾发现莫氏“《西昆酬唱集》二卷”条中窜入邵本“《唐文粹》”条文字的错误，并批曰：“钞袭邵目，竟将上条《唐文粹》语误植于此，后自说自话若彼，岂不可笑。年案。”但他马上将矛头指向了莫氏后人，复批曰：“后段抑莫氏后人所加欤？”今人韦力又进而推测：“误植此语者，除却‘莫氏后人’，是否亦有可能是田中庆太郎欤？”^①他们都首先将莫友芝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这都是晕轮效应的正常反应。

对于名人们曾经的努力和对学术的贡献，我们当然应予以以足够的尊敬。然而尊敬名人不等于轻信盲从，基于事实的怀疑有时比一味尊敬更可贵。李致忠先生曾据国家图书馆藏大德九年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纠正了《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得之传闻的错误，并讥之为“粗疏与欺罔”^②，此语虽可再酌^③，但却提醒了我们治学“来自传闻未经目睹”的危险性。“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世事沧海桑田，也许只有实事求是的道理，才会永远颠扑不破吧。

【作者简介】张剑，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明清文学文献。

①韦力：《芷兰斋书跋续集》之《杨康年批校〈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54页、第257页。

②李致忠：《元大德本〈梦溪笔谈〉》，《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③翁仲康曾对李致忠先生关于莫友芝学问“粗疏与欺罔”的批评提出过反对意见，说详其《简介〈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评莫友芝做学问是否“粗疏与欺罔”》（《贵州文史论丛》1991年第1期）一文。案，翁文关于《邵目》对元刻《梦溪笔谈》的误载系袭自丁丙的推测是可信的，但他认为这条误注是在莫氏去世后由“他人掺入”，并非莫氏本人所为，则系误断，未摆脱莫友芝名声带来的晕轮效应的影响。事实上，莫氏常转述概括他人著述以为习学或教研之资，对于这些私人笔记杂钞或教材类文字，莫友芝生前从不曾将之整理付梓或以之渔利猎名，如《邵亭知见传本书目》、《韵学源流》的问世均系后人所为，确实不宜以这些文字来判断其学问是否“粗疏与欺罔”。关于《韵学源流》的公案及莫友芝治学特点，可参笔者《〈韵学源流〉作者考实》（《文献》2007年第3期）一文。